

“发明学术”：民国时期《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与史语所学派的建构

刘春强，李一平

(聊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聊城 252059)

摘要：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代表了中国学术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典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以“发明学术”为定位，通过征稿、审稿等制度提升学术论文的质量，着力打造学术重心，注重培养学术后备军，推动了史语所学人的代际转换。因此，《集刊》可谓为建构史语所学派的主要阵地之一。

关键词：《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史语所学派；“发明学术”；学术重心；代际转换

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24)02-0129-12

收稿日期：2023-12-01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21CLSJ02)：何以经世：夏鼎与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发展研究。

作者简介：刘春强(1980-)，男，山东临沂人，聊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李一平(1999-)，女，山东阳谷人，聊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DOI:10.16284/j.cnki.cn37-1401/c.2024.02.017

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树立了中国学术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典范，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特色。研究这一学术现象，成为学界的热点问题，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史语所学人在学术议题、史料开掘等方面形成了独特的学术风格，史语所的传承人多认同史语所^①。史语所外的学术研究多以史语所学术成果为参照体系，以确立不同于史语所的学术路径^②，甚至从思想上批判史语所的学术立场和态度^③。“学派”成为时人和后学认识史语所的重要学术视角。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许冠三为代表的学人以“史料学派”评价史语所的学术风格，搭建了后学研究史语所的框架结构^④。不过，许冠三对史料学派的分析集中于傅斯年和陈寅恪两位学人，而非以史语所为重心。进入二十一世纪，伴随着新材料的发掘和出版，以史语所为对象的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史实的发掘和解释不断挑战“史料学派”的解释框架，比如傅斯年史学亦有“疏通致远”的面相^⑤，史语所史学经世价值的发掘^⑥。台北的史语所也在不断丰富和发展史语所的学术和思想内涵，不再借用“史料学派”概念，而更多使用“史语所”之用语以言“学派”之构建^⑦，可谓为“史语所学派”。

在史语所学派构建过程中，集刊、专刊、报告是史语所发布学术成果的重要平台，扩大了史语所在国内外的学术影响力，成为值得关注的近代学术现象。其中，《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以下简称《集刊》)最为学界重视^⑧，在史语所学术转型中具有重要地位。关于《集刊》的研究，学界虽然取得了一定学术成果，

①中国台湾地区每到关键时间节点，都举办关于傅斯年和史语所的纪念活动；在中国大陆，1980年代以后，聊城地方政府和聊城大学先后举办多次纪念傅斯年的学术研讨会。海峡两岸的学术纪念活动成为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

②贺登崧对中国方言的调查与研究，以史语所的学术研究为参考体系。见[比]贺登崧：《汉语方言地理学》，石汝杰、岩田礼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

③徐复观：《学术与政治之间》，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第427页。

④许冠三：《新史学院》，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第227-288页。

⑤罗志田：《证与疏——傅斯年史学的两个面相》，《中国文化》2010年第2期。

⑥李帆：《求真与致用的两全和两难——以顾颉刚、傅斯年等民国史家的选择为例》，《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3期。

⑦王汎森：《历史研究的新视野：重读〈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古今论衡》2004年第11期。刘龙心：《一代旗手傅斯年：一个学术网络的观察》，收入氏著：《知识生产与传播：近代中国史学的转型》，第183页。

⑧劳榦：《出版概况与集刊的编印》，《傅所长纪念特刊》，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1年，第45-60页。

不过仍有待掘空间^①。本文试图从《集刊》功能角度比如期刊定位、审稿制度、学术特色的打造及学术后劲的培养等方面,分析该期刊如何推动了史语所学派的形成,以考察史语所学派形成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一、《集刊》的定位与史语所的“发明学术”

根据史语所工作报告,史语所学术成果发布平台分为集刊、单刊、专刊以及史料集等四种^②。集刊、单刊和专刊,是发布个人学术成果的主要平台。单刊与专刊,篇幅较大,大多为个人学术专著。集刊包括《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安阳发掘报告》(后易名为《田野考古报告》)《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集刊》,后两者是考古组、人类学组学人发表个人学术研究成果的主要平台,不对外征稿,而《集刊》的办刊原则具有开放性,作者不限于史语所学人,成果范围以历史学、语言学为主,兼及考古学、所务工作等方面。

(一)“工作旨趣”而非“个人旨趣”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被视为阐释傅斯年史料观的核心材料。不过,学界长期以来将文中“工作之旨趣”混同为傅斯年的“个人学术之旨趣”,并建构起傅斯年“史学便是史科学”的历史观。关于史语所的旨趣,傅斯年明确道:“先生在此意义之下创置此所,我等亦在此意义下敢效其绳勉之劳,故当确定旨趣,以为祈向,以当工作之径,以吸引同好之人,以敬谢此项客观的史学、语学不同趣者。”^③“以当工作之径”一语,说明了《旨趣》是史语所向社会公布其工作纲领的旨趣书。同时,《旨趣》刊发时没有署名,亦可间接说明旨趣是研究机构的工作旨趣,而非私人的学术旨趣,因而不宜视为傅斯年史学思想的完整表述。^④

从史语所的发展史看,史语所初创时,傅斯年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浓厚的傅斯年个人色彩。后人甚至认为民国时期的史语所,处于“傅斯年时代”。傅斯年在《史语所的性质与位置》一文中叙述了史语所筹建的艰难。为尽快确立史语所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傅斯年曾立下军令状,他写道:“中央研究院语言历史研究所业已筹备,决非先生戏称兔免二窟,实斯年等实现理想之奋斗。为中国而豪外国,必是勉匍匐以赴之。现在不吹,两年后必有可观。”^⑤“两年后必有可观”一语说明,如何完成这一任务是史语所当时的工作重心。

在此语境之下,傅斯年在《旨趣》中提出“史学便是史科学”具有明显的工作性质。作为一个人文领域的学术机构,如何才能取得可以量化的成绩呢?首先,傅斯年认为史语所的工作是纯粹科学的、客观的工作,他写道:“甲、辅助从事纯粹客观史学及语学之企业、乙、辅助能从事且形式纯粹客观史学及语学之人。”因此,“客观”是史语所的工作原则。其次,“客观”意味着这项事业又并非个人所能完成,而需要“集众”式的工作。集众工作的核心是“材料搜集和工具使用”,《报告书》写道:“研究所工作之异于个人工作者,即在前者能合众力以为大举,后者但凭个人之才力与际会而已。……材料寻求、工具使用,均待团体而成,故合众工作乃真研究所之工作。”^⑥所谓“真研究所之工作”,就是史料的搜集整理、图书馆建设、考古发掘、方言调查等这些“动手动脚”的科学实践。只有如此,史语所才能取得让学界瞩目且可以量化的成果,才能完成“两年后必有可观”的承诺。

①以《集刊》为研究主题的代表性成果有台北学者逯耀东的《傅斯年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大历史学报》1996年第20期;大陆学者朱守芬的《傅斯年和〈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史林》1999年第3期;孔祥成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史学方法创新初探:以〈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28-1948)为线索》《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等。

②《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收入欧阳哲生编:《傅斯年文集》第4卷,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30页。

③《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报告书第一期》,《傅斯年文集》第4卷,第31页。

④蒋俊:《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128-130页。黄进兴《机构的宣言:重读傅斯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复旦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虽标题凸显“机构”,然内容重心则是傅斯年的学术思想。

⑤《傅斯年致胡适》,《傅斯年遗札》第1卷,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1年,第113页。

⑥《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报告书第一期》,第32页。

作为一个学术结构,傅斯年对史语所在近代史学潮流中的角色有着清晰的定位。傅斯年认为,史料的保存是人类文化延续和发展的关键,西欧近千年文化有“继续性”的原因在于:“西欧史料经教会与贵族之保存,于是史学方面,得以有继续性之进展”^①。史语所创建的使命即是为国家搜集、整理和保存史料,以保持中国文化的“继续性”。因此,这一任务,不仅是一个学术事业,还是一个文化和政治任务,关乎中国文化的复兴。在傅斯年致陈寅恪、陈垣等学人的聘书中屡屡言及此意。他写道:“斯年留旅欧洲之时,观异国之典型,惭中土之摇落,并汉地之历史言语材料,亦为西方旅行者窃之夺之,而汉学正统有在巴黎之势,是若可忍,孰不可忍?幸中国遗训不绝,典型犹在,静厂先生驰誉海东于前,先生鹰扬河朔于后,二十年来,承先启后,负荷事业,俾异国学者莫我敢轻,后生之世得其承受,为幸何极!”^②在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中国,史语所搜集和整理史料工作,承担了复兴中国文化的使命和担当,彰显了史语所的学术定位和文化情怀。

(二)“个人旨趣”与“发明学术”

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亦须以个人研究为基础,其中个人兴趣起着关键作用。史语所对此有清晰的认知,报告写道:“此后随组中个人的兴趣而企图整理宋人笔记,订正《宋史》,或编撰明清之际史料长编。”^③史语所的创立,一方面以史料搜集和整理为重心,另一方面则以阐发新观念为学术事业的灵魂。在阐述“研究所设置之意义”部分,《报告书》写道:“中央研究院设置之意义,本为发达近代科学,非为提倡固有学术,故如以历史语言之学承固有之遗训,不欲新其工具、益其观念,以成与各自然科学同列之事业,即不应于中央研究院中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使之与天文、地质、物理、化学等同伦。……此虽旧域,其命维新。”^④因而,史语所在批判“固有学术”的视野下从事学术研究,以“新其工具、益其观念”为发展方向。而“此虽旧域,其命维新”的用语,进一步彰显了史语所作为新史学机构的使命和担当。

新材料、新方法和新观点,成为“其命维新”的重要内容。《报告书》继续谈到,“材料与时增加,工具与时俱进,观点与时推进”,“扩充材料、扩充工具,以工具之施用,成材料之整理,乃得问题之解决,并因问题之解决,引出新问题,更要求材料与工具之扩充,如是申张,乃向科学成就之路”。材料是基础,工具是方法,而新问题之解决则是史语所的重要学术方向。问题的解决,主要凭借个人学术研究,史语所在研究报告中写道:“研究历史上各项问题,本随各人治学兴趣不同而异其趋向。”^⑤傅斯年邀请陈垣、陈寅恪等学人加入史语所,其学术目标并非仅仅将诸位学术名家视为资料搜集的工作人员,而是通过“工作旨趣”之认同以建构“科学的东方学”。

从工作性质来看,史语所的工作分为侧重史料搜集和整理的集众工作和侧重学术议题的个人研究^⑥,在明确集众研究的同时,仍然要进行个人研究^⑦。从个人学术研究的角度,“科学的东方学”的事业以诸位学人的学术理想为基础,并提供学术平台以展示诸位学人的学术抱负。《集刊》的定位,即在发表史语所学人的重要学术发明和创新成果。

傅斯年认为《集刊》上的文章,为“最重要之发明”,因此《集刊》在重要性上并不比专刊、特种刊物次要^⑧。《集刊》也被学界视为最具权威性的杂志^⑨。什么是发明?傅斯年等学人诠释了发明学术之内涵。对于发现与发明的关系,傅斯年认为发明以发现为基础。在《性命古训辨证》一文中,傅斯年认为程朱学说是孔子“道问学”体系上作“引申者”,因而是孔子学说的“发明者”^⑩。而在讨论李习之在儒家性论发

①《中西史学观点之变迁》,《傅斯年文集》第3卷,第163页。

②《傅斯年致陈垣》,王汎森等编:《傅斯年遗札》第1卷,第190页。

③《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八年度报告》,《傅斯年文集》第4卷,第60页。

④⑦⑧《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报告书第一期》,第31页,第32页,第30页。

⑤《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八年度报告》,第59页。

⑥《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二十年度报告》,《傅斯年文集》第4卷,第314页。

⑨季羨林:《回忆老师陈寅恪》,《水木清华》2020年第9期。

⑩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傅斯年文集》第2卷,第700页。

展中之地位中，傅斯年言：“李氏沾沾自喜，以为独得尼父之心传，实则将《中庸》《大学》等书自戴记中检出而高举之，其贡献在于认出此一古代心学之所在，不在发明也。”^①所谓“认出”即发现，以区别于“发明”。傅斯年通过区分“发现”与“发明”，重新定位了李习之在儒学史上的地位。罗常培借用罗郢中的观点进行了理论阐释，他说：“它（史学）的责任是把过去人类活动的事实，交相映射的人事，求出一个因果关系，说明他们演变的真相。贵在从一种蒙昧的事物状态之下，求出它分析的、清楚的客观事实。它只是推陈出新，一天一天开发那草昧的路；问题越来越新，分析越来越密，前修未密，后出转精，新得的条理、答案都是前古所无——这便是发明。”^②罗常培认为有八项不能算作研究工作，其中包括“调查”和“报告”之类。因为“只把材料有闻必录地写下来，而不能从所得的材料里找出问题、分析综合来构成系统、求得结论的，不能算是研究。”^③史语所的档案显示，史语所还曾提议设立科学发明奖^④。因此，《集刊》的特点在于发表“学术发明”之文章，这一定位反映了史语所兼重史料基础和史料解释的历史观，并推动了中国史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⑤。

二、《集刊》的征稿、审稿与学术研究质量的提升

（一）高质量的多元作者群

《集刊》第一本第一分“本刊附白”中，明确告知读者，“本刊原为本所同人刊发其论著之用，但国内外同业此学者愿以其著作投登时，本所当敬谨斟酌之”。据统计，《集刊》共发表了109位作者的447篇论文^⑥，其中95位作者是包括所内研究人员以及所外的通信研究员、特约研究员在内的研究人员^⑦。95位作者在《集刊》共发表428篇文章，发表文章数占比95.7%。这些数据说明《集刊》主要是史语所同人发刊其论著的平台。

同时，《集刊》仍有17名作者是所外学者，即赵荫棠（1篇）、A·Dragunov（1篇）、吴其昌（1篇）、唐肇黄（1篇）、陈乐素（2篇）、闻宥（1篇）、陈叔陶（1篇）、孙楷第（1篇）、谷霁光（1篇）、吴晗（1篇）、余嘉锡（1篇）、杨树达（1篇）、李四光（1篇）、朱倓（1篇）、庞新民（2篇，其中与姜哲夫、张伋合作1篇）、姜哲夫（2篇，其中与庞新民、张伋合作1篇）、张伋（与姜哲夫、庞新民合作1篇），共发表文章19篇，占比4.3%。这些作者来自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湖南大学、北平图书馆、中研院地质研究所等国内外高校、研究机构。上述统计说明《集刊》贯彻了开放性原则，与所外学术机构保持良好的学术交流。

（二）编委会的设立与演变

《集刊》的征稿与审稿，对于打造史语所品牌及提升论文质量起着关键作用。《集刊》创刊之时，没有编委会，亦未制定编委会规章制度。《集刊》第一本第一分没有署名编委会，其编辑与顾颉刚关系密切。1928年，史语所的筹备受大学院之委托在广州由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三人筹备。傅斯年主要负责所外活动，所内事务基本交与顾颉刚处理^⑧。顾颉刚亲自组织该期杂志的征稿工作。《集刊》第一本第一分共117页，除《所务记载》的《造像征集启》及《本所对于语言学之范围之旨趣》外，其目录有：

发刊辞·蔡元培；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本所筹备处；跋唐写本切韵残卷·董作宾；建文逊国

①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第703页。

②罗常培：《研究工作的性质》，《罗常培文集》第10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65页。

③《研究工作的性质》，第380页。

④《历史语言研究所对于优奖发明一案意见书》，《傅斯年文集》第4卷，第154页。

⑤逯耀东：《傅斯年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大历史学报》1996年第20期。

⑥赵元任撰写的《刘半农先生》以及罗常培撰写的《白涤洲小传及著述提要》不计入总数。

⑦196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四十周年纪念特刊》制定公布了史语所人员名录。本文所言《集刊》所内同人作者群主要参考了这一名录，主要包括史语所内研究人员、特约研究员以及通信研究员。

⑧《顾颉刚致胡适》，《顾颉刚书信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49页。

传说的演变·胡适；殷亡史说·丁山；易卦爻辞的时代及其作者·余永梁；占卜的源流·容肇祖；数名古谊·丁山；周颂说附论鲁南两地诗书之来源·傅斯年。

除蔡元培撰写《发刊辞》外，《工作旨趣》由傅斯年亲自执笔，以本所筹备处的名义发表。这篇文章在5月中旬已经定稿。因此，《集刊》集稿与编辑工作在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之初，已由顾颉刚负责进行。他在3月22日写信给胡适说：“孟真能读书，能办事，而不太上轨道……现在中央研究院要办《集刊》，或可按住他的野性，作出一文。先生一文已收到，肯把这文放在中央研究院集刊吗？”^① 胡适的“一文”，就是《集刊》一本的《建文逊国传说的演变》，傅斯年的《周颂说附论鲁南两地诗书之来源》，则是顾颉刚逼出来的。其他的论文都是当时中山大学的同人，或语言历史研究所的工作人员。

《集刊》自第一本第三分开始制定编委会制度。傅斯年在致陈寅恪的信中言：“自第三期，实行以所务会议为编辑部之法。”^②《集刊》编辑委员会成员较为固定，主席为傅斯年，编委会成员为陈寅恪、赵元任、李济。1931年起，《集刊》第三本第二分设编委会的常务，人员一名，其中罗常培、董作宾先后担任此职。编委会亦稍有变化，一是赵元任因不在所内常由李方桂、罗常培等人代理；二是，1947年出版的第十二、十三本，傅斯年的主席之职由夏鼐代行；三是，1949年的第二十本下和第二十一本第一分，刊物不设编委会而为编辑者，编辑者为夏鼐、陈寅恪。另外，集刊外编第一种《纪念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常务为罗常培^③。

（三）审稿

为建立“科学的东方学”，傅斯年对史语所各项工作充满自信，他说：“现在不吹，我等自信两年以后，必有可观。”^④《集刊》作为刊布史语所研究成果的重要平台，高质量的稿源是扩大其影响力的重要保障。傅斯年时常督促各位研究人员加快研究节奏，多出、早出研究成果。针对史语所内研究员多有在高校任课者，傅斯年想出一个两全之策，他说：“所任课题必是自己目下研究之范围内者，弟更借此时时刻刻要稿子。不编讲义，只做论文，论文即是《集刊》的稿子。”^⑤ 因此，在此条件下，各位研究人员既能集中专题研究，又能保障《集刊》的稿源充足。

对于第一代研究人员的稿件，史语所借助《集刊》通过序、跋等形式进行审查，与作者交流。董作宾出版《殷历谱》前，请傅斯年为之作序。实际上，此序亦是一种审查，“吾见彦堂（董作宾）积年治此，独行踽踽，倍感孤诣之苦”，因而常“反其说，说而不休，益之以怪”，周围的朋友“知此，亦常无义而与之强辩以破寂焉”^⑥。为了回应学界同仁的意见，董作宾在《集刊》亦撰文进行回应。

每位研究员都有指导青年学人写文章之责任和义务^⑦，青年学人研究主题的选择和论文的撰写皆得到各位学术带头人的指导。集众研究意味着集众审查，研究人员的研究选题、资料搜集整理、出版等过程皆受所内专家的监督和审查。1933年春，陈垣在与胡适、陈寅恪、钢和泰等友朋的小型聚会上，便将陈述之文转交各位友朋传看，得到了与会学者的一致认可，甚得陈寅恪的好评^⑧。因得到陈垣力荐，陈述的《金史氏族表初稿》得以在《集刊》上发表，成为他进入史语所的关键环节。进入史语所后，陈述研究辽史的过程更体现了史语所审查之严，《全辽文》的史料整理是受史语所之命，甚至研究题目命名皆要听取专家意见^⑨。此后，陈述在资料搜集、体例确定等方面，都积极与傅斯年以书信形式报告研究进程及遇到的问

①《顾颉刚致胡适》，《顾颉刚书信集》第1卷，第450页。

②《傅斯年致陈寅恪》，《傅斯年遗札》第1卷，第168页。《傅斯年致蔡元培、杨铨》，《傅斯年遗札》第1卷，第168页。

③《本所告白》，《纪念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北平：京华印书局，1935年，第1135页。

④《傅斯年致胡适》，《傅斯年遗札》第1卷，第111页，第437页。

⑤董作宾：《殷历谱》，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5年，第2页。

⑦《傅斯年致李方桂》，王汎森等主编：《傅斯年遗札》第3卷，第1370页。

⑧刘凤翥、陈智超：《陈述先生忆往事》，《中国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3期。

⑨《陈述来函》，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630页。

题^①。后来陈述在《集刊》发表了多篇高质量论文，从而奠定了其在学术界的地位。

陈寅恪对历史组青年学者在《集刊》发文颇有提携之功。周一良曾在《集刊》上发表了《南朝境内的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宇文周的种族》《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等三篇文章。周一良回忆说：上面三篇文章“与在燕京所写《魏收之史学》路子有所不同，是陈先生影响之下的成果”^②。季羨林说：“我写了一篇文章：《浮屠与佛》，首先读给他（指陈寅恪，引者）听，想听听他的批评意见。不意竟得到他的赞赏。他把此文介绍给《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发表。”^③

考古组的文章皆要经过梁思永、李济审查。尹达、石璋如言：“李先生说，文章大概都要经过梁先生的眼的。”^④ 石璋如在完成《传说中周都的实地考察》以后，先后送给李济、徐中舒、郭子衡、劳榦、夏鼐、高去寻等处请教，其中徐中舒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思路以与石璋如商榷。最后，该文发表时，石璋如以“后记”形式，对各位同仁表示感谢，并对徐中舒的意见进行了回应^⑤。

语言组的于道泉能够出版《仓洋嘉错情歌》一书，更反映了集众研究和审查的优势。于道泉最初颇有兴趣编一本藏汉佛教词典，但没有获得史语所专家的认同。傅斯年表示不同意，尤其是陈寅恪认为“史语所出版的书，必须要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在陈寅恪看来，编藏汉佛教词典，不仅要精通藏文和佛教，还需要精通印度的梵文，当时的于先生还不完全具备这些条件”^⑥。于道泉的例子，说明了史语所研究人员研究主题和领域的选择需要经过专家的认可和审查。于道泉此时正在赵元任的语音学练习班学习，而《仓洋嘉错情歌》是与赵元任合作过程中形成的一份“旧稿子”。因是集众合作的产物，很快便得到史语所同人的认可，并予以出版^⑦。周法高在罗常培的指导下将硕士论文部分内容发表于《集刊》，奠定了在学界的地位。他说：“我深深地感觉到：早期的研究有时候超过后来的研究。……《玄应音研究》中所包含的几篇论文，在发表的时候虽然也经过两三年的修订而加以扩充修正，但是最初的开端是在这两年中形成。而我在居然在以后的四十余年中竟然没有写出一篇比《广韵重组的研究》更好的文章，真是使我觉得颓丧得很。后来虽然有充足的功力，绵密的组织，可是在创见方面却缺少一点冲劲。”^⑧

另外，史语所还定期举办学术讲论会，提高青年研究人员的论文质量。傅斯年等研究员经常参加讲论会，通过批评、辩难等形式推动研究的深入，以提高《集刊》文章质量。史语所的青年研究人员在发表自己成果前，大多先在讲论会接受批评辩难。张政烺的学术研究在傅斯年看来就比较具有“critical”^⑨。王崇武的明史研究成果、高去寻的铜镜研究在《集刊》的发表之前都曾参加过讲论会^⑩。

三、《集刊》与史语所学术重心的打造

史语所创办之初注重打造学术重心和学术高地。《旨趣》中根据学术分类曾计划设置九个组，其中历史类五个组即文籍考订、史料征集、考古、人类及民物，和比较艺术；属于语言者四组，即汉语、西南语、

①陈寅恪：《陈述在史语所时期的学术发展》，杜正胜、王汎森主编：《新学术之路》下，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第504-507页。

②周一良：《毕竟是书生》（续一），《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1期。

③季羨林：《回忆老师陈寅恪》，《水木清华》2020年第9期。

④《刘耀、石璋如致李光宇》，王明珂主编：《史语所旧档文书选辑》，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8年，第233页。

⑤石璋如：《传说中周都的实地考察》，《集刊》第20本下册。

⑥王邦维：《于道泉先生小记》，《新学术之路》（下），第561页。

⑦《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八年报告》，第83页。王邦维：《于道泉先生小记》，杜正胜、王汎森主编：《新学术之路》下，第560页。

⑧周法高：《记昆明北大文科研究所》，《传记文学》1983年第1\2期。

⑨周一良：《史语所一年》，《新学术之路》（下），第557页。

⑩夏鼐：《夏鼐日记》第3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5、157页。

中央亚细亚语和语言学^①。史语所分组几经调整,直到1929年春确立史学、语言学及考古学三组。1934年因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并入,乃有第四组人类学组。研究组别的调整,实际上是史语所学术规划的外在表现。《集刊》的成果发表情况,基本反映了史语所对学术方向的引导。^②

(一) 集中、持续发表学人研究成果

在充分占有学术资料基础上,各位学人多依据个人兴趣在各自领域进行精耕细作,时有重要“发明”。各位学人的优秀成果,大多优先考虑在《集刊》上发表。由《集刊》发表文章总数,可以看出学人的学术创新能力及在学界的影响力。在《集刊》发表5篇论文以上者就达到23位学人,岑仲勉38篇、陈寅恪28篇、劳榦26篇、徐中舒18篇、陈槃16篇、全汉昇15篇、傅斯年14篇、李光涛13篇、罗常培13篇、王崇武10篇、董作宾10篇、丁山10篇、张政烺9篇、赵元任8篇、王静如9篇、李方桂8篇、陈述8篇、周法高7篇、董同龢7篇、丁声树6篇、逯钦立6篇、芮逸夫5篇、胡厚宣5篇。

由每位学人文章发表总数可以窥见诸位学人的治学特色及《集刊》的办刊特色。第一,《集刊》共发文447篇,陈寅恪、岑仲勉两人发表了66篇文章,占比14.8%。两人所从事的中古史研究尤其是隋唐史研究成为《集刊》重要特色领域。史语所历史组在陈寅恪带领下,在发表文章总数前十名中,除罗常培属于语言组外,其余9人皆是历史组成员,因此历史组可谓为《集刊》稿源的顶梁柱。

第二,为突出《集刊》的特色,《集刊》不限定个人文章发表数量。各位学人可以连续多期在《集刊》集中发表,甚至个人可以“包办”一期。《集刊》每“分”发表文章大约在4-14篇文章。1947年后,因抗战挤压了大量文章,《集刊》大多按“本”发表,不再设“分”,最多时一本发表了27篇论文。岑仲勉在第12本(1947年)发表了13篇文章,该期共发表27篇文章,占比48%,是同一期《集刊》上发表文章最多的学人。

第三,《集刊》从1928-1949年共出版四十六期,因抗战进行,学术研究受到严重影响。因此,从每位学人文章发表总数亦可窥见学人学术的延续性。学术的延续性,表明了学人学术发明的持久性及对史语所的贡献。陈寅恪是发表文章连续性最好的学人,即使抗战时期仍然笔耕不辍,共在十七期上发表。另外,青年学者徐中舒和劳榦在十五期《集刊》上发表论文,岑仲勉为十二期。发表文章持续性,反映了学人在同一领域的持久深耕,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

(二) 打造学术重心

史语所学人以“直接史料为研究对象”,进行集众式搜集、整理商周遗骨甲骨陶瓦等殷墟材料、敦煌材料、明清档案和方言调查资料,提出了诸多独特的学术理念,开拓、深化了上古史、中古史和近代史^③三大领域,在语言学领域亦树立了史语所的学术旗帜。

1. 重建中国上古史

传统“中国文明起源说”认为华夏历史一脉相承。受疑古思潮影响,傅斯年留学期间就树立重建上古史的学术抱负,形成了“民族与古代中国”的议题,论证了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论。史语所创办后,傅斯年以中国民族文化的原始问题为引导^④,拓展了史语所的学术事业。其中,傅斯年个人曾计划于1932或1933年以史语所“单刊”名义出版《民族与古代中国》一书^⑤。与“民族与古代中国”议题相关的论文先后在《集刊》发表。傅斯年在《集刊》共发表了14篇,其中关于“民族与古代中国”议题的论文包括《大东小东说: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后乃东迁》《论所谓五等爵》《姜原》《夷夏东西说》《周东封与殷遗民》《战国古籍中之篇式书体——一个段记》《周颂说》《谁是“齐物论”之作者?》《跋陈槃君〈春秋公矢鱼于棠说〉》

①《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第11页。

②《中央研究院概况》(六十周年院庆纪念),第212页。

③《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4卷,第19页。

④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几个基本观念及几件重要工作的回顾》,《李济文集》第5卷,第169页。

⑤《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二十一年度报告》,第411页。《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二十二年度报告》,第457页。

等 9 篇文章。傅斯年上述议题的核心是提出“夷夏东西说”，该学说认为中国文明存在东部以东夷-商为文化与西部以周为中心的对峙局面，殷墟发掘则证实了这一观点。傅斯年的学生何兹全曾评价：“就这一本未完成的书之完成的几篇文章，已足以使得傅斯年坐上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大师的宝座，享有大师的荣誉。”^①

在上古史领域，青年学者徐中舒先后发表了《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宋拓石本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残页跋》《殷周文化之蠡测》《宋拓本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残本再跋》《剥字解》《土王皇三字之探原》《幽风说：兼论诗经为鲁国师工歌诗之底本》《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说尊彝》等 8 篇文章。早在加入史语所之前，徐中舒曾发表《从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民族》一文论证了殷周属于不同的民族因而文化并非一脉相承。加入史语所后，根据殷墟发掘资料，徐中舒再次“检讨”殷周历史，证实了商周不同文化源头的观点。徐中舒的观点，与傅斯年相互配合，再加上考古组考古发掘成果，构建了史语所重建上古史的学术格局和学术重心。

2. 中古史研究的引领者

陈寅恪对史语所学术重心的发展贡献极大，被后人成为单打独斗的高手。1928-1949 年，陈寅恪共发表文章 52 篇，其中在《集刊》发表文章 28 篇，占比 53.8%。陈寅恪 28 篇文章致力于不同的问题，《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崔浩与寇谦之》等文章注重地域、家族与文化的关系诠释，《李唐武周先世事迹杂考》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魏书司马叡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等论文致力于种族与文化的研究，《东晋南朝之吴语》《魏书司马叡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和《论东晋王导之功业》等文关注时兴的阶级与文化问题，《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论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则提出了影响学界深远的“关陇集团”核心概念。通过这些文章，陈寅恪建构起内涵丰富的中古史理论体系。

种族和文化问题尤其李唐氏族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1930 年代，关于李唐氏族的出身来源，有夷狄说和陇西望族说。1931 年陈寅恪发表了《李唐氏族之推测》，提出李唐氏族乃赵郡李氏旁支一说，并引起国内外学界讨论。北京大学教授朱希祖发表《驳李唐为胡姓说》《再驳李唐氏族出于李初古拔及赵郡说》，日本学者金井之忠撰写了《李唐源流处于夷狄考》，推动了关于该问题的讨论。陈寅恪在《集刊》发表《李唐武周先世事迹杂考》《三论李唐氏族问题》两篇文章予以回应，表明了自己的科学态度以及中国立场^②。在这场讨论中，《集刊》扮演了与国内外学界对话的平台角色，彰显了史语所在国际界的独特地位和价值。

岑仲勉在入史语所之前，已得陈垣、陈寅恪之赏识被视之为“南学”之代表^③。因此，傅斯年邀约岑氏加入史语所^④。1937 年 7 月，岑仲勉入职史语所历史组，成为《集刊》发文最多的作者，共发文 38 篇。岑仲勉研究领域集中于中古史领域，展现了中古史研究的文献考证之风格，与陈寅恪同为中古史领域的两位大师级学者^⑤。

陈寅恪、傅斯年、岑仲勉积极引导邓广铭、傅乐焕、陈述等青年学子在宋史、辽金史领域积极开拓，青年学人亦在《集刊》发表了《辽代四时捺钵考五篇》《宋辽聘使表》《辽史复文举例》《金史氏族表初稿上》《金史氏族表初稿下》《曳落河考释及其相关诸问题》《乱军考释初稿》等 13 篇文章。邓广铭在宋史领域具有“筚路蓝缕之功”^⑥。傅乐焕偏向宋辽关系史及契丹史，与陈述的辽金制度研究，相辅相成，成绩显著，二人被顾颉刚推为“辽金史上成就最大的学者”^⑦。

明史因与现实关系密切，颇受青年学子的重视。南炳文认为，民族危机的不断加重推动了明史研究的

①傅斯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前言”第 4 页。

②汪荣祖：《陈寅恪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 年，第 110-114 页。

③《陈寅恪致陈垣》，《陈寅恪书信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年，第 129 页。

④《傅斯年致岑仲勉》，《傅斯年遗札》第 2 卷，第 797 页。

⑤项念东：《岑仲勉对陈寅恪之学术批评及其内在问题》，《社会科学论坛》2012 年第 3 期。

⑥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第 91 页。

⑦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第 91 页。

发展^①，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则为明史的研究奠定了史料基础。李光涛在《清入关前之真象》一文中提出自己整理档案关注的核心问题。他说：“（清军）何以后来曾志于中原？何以后来又更会统一了中国？”^②李光涛经过爬疏档案、对比新旧史料先后完成了《清太祖对明求款的主要原因》《清入关前之真象》《记建州与流贼相因亡明》《洪承畴背明始末》等文。王崇武则关注明初政治形势，其研究特色是注重社会史的视角。他写道：“旧史记明太祖起事虽详，惟就其家世遗传、环境熏习以及前后政策不同以立说者则较少，兹试论之。”^③王崇武在《集刊》先后发表了《明初之用兵与寨堡》《论明太祖起兵及其政策之转变》《读高青丘〈威爱论〉》等论文。

在明史研究领域，史语所的成绩受到学界关注。其中，明成祖生母问题成为学界聚讼之热点。1932年傅斯年在《集刊》发表了《明成祖生母记疑》，引起了朱希祖的商榷之文《明成祖生母记疑辩》。此后，李晋华、吴晗先后加入傅斯年的行列，李晋华表了《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证》上、下两篇，傅斯年为此文撰写跋语《跋〈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证〉并答朱希祖先生》，吴晗则在《清华大学学报》发表了《明成祖生母考》。朱希祖在《东方杂志》发表《再辩明成祖生母》《再驳明成祖生母为硕妃说》予以回应。这场关于明成祖生母问题的讨论，深化了陈寅恪种族-文化学说的传播，展现了史语所学人史料发掘、史料解释的独特学术风格。

因此，史语所历史组在陈寅恪、傅斯年、岑仲勉带领下取得了令国内外学界瞩目的成绩，引领学界关注、融入中古史领域。

3. 语言学的国际化路径

语言学是史语所的另一学术重心。傅斯年在《旨趣》中明言要挑战章太炎的权威，因此与赵元任合作，希望以科学的工具“复兴中国的语言学”^④。《集刊》共发表语言学类文章73篇，成为语言学组成果主要发布平台。语言学组在赵元任、罗常培等人带领下，以国家学术机构身份进行方言调查，丰富了语言学研究的史料和工具，培养了王静如、于道泉、周法高等青年学者。语言组是史语所较多与国际学界进行交流的学术团队，注重与伯希和、高本汉等国际汉学家的学术交流，该组的研究因而“曾使做第一把交椅的中国语言学家、瑞典高本汉教授为之咋舌”。^⑤

语言组合群力翻译了高本汉的名著《中国音韵学研究》，继承、批判了高本汉的音韵学研究路径。另外，推进史语所学人尤其青年学者与高本汉进行商榷，成为《集刊》的特色之一。其中，《集刊》第一本第四本以附录形式登载了赵元任与高本汉关于臻榦韵的书信往来，第二本第三分就登载了罗常培对高本汉切韵音读的商榷之文。青年学人刘学潜于《集刊》第二本第四分登载了《D·Jone&KwingTongWoo 胡（綱堂）共作的 Supplement to the Cantonese Phonetic reader 的勘误》一文，唐虞在第三本二分发表了翻译俄罗斯汉学家龙国夫与高本汉、马伯乐的商讨文章。1938年，针对高本汉诗经和老子研究中韵语问题，董同龢在《集刊》撰文《与高本汉先生自由押韵说兼论上古楚方音特色》与之商讨。

青年学人王静如尤为重视与国外汉学家的交流，努力打造西夏学研究的中心。王静如完成了《西夏研究》第一辑和第二辑的研究，在《集刊》发表了9篇文章，先后与汉学家闵宣化、伯希和、高本汉、箭内互等国际知名语言学家进行对话。1936年，王静如因在西夏学领域取得骄人成绩荣获法国法兰西学院儒莲奖。

民国时期不同学术群体、学者个人注重方言调查，史语所的语言学调查和研究的学术风格，被贺登崧

①南炳文：《二十世纪的明史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

②李光涛：《清入关前之真象》，《集刊》第12本。

③王崇武：《论明太祖起兵及其政策之转变》，《集刊》第10本。

④⑤⑥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李济文集》第5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8页，第169页。

称为新语法学派^①。贺登崧认为，史语所的语言学研究继承了伯希和、高本汉的文献语言学方法^②，并从方言地理学的理论角度对史语所的方言调查进行了批评。贺登崧批评史语所的语言调查太注重音律，没有重视活的语言^③。史语所语言组非常重视外国学者的批评，并积极回应。董同龢在1948年在《集刊》第十九本发表《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他写道：

去年九月间本篇初稿将成之时，赵元任先生从美国来信，有云：“Momumenta Serica 上有一篇 W·A·Grosteans 写的文章，谈近年中国语言研究。他批评咱们的工作像 Neo-grammarians，这就是说他以 Phonetic Law 为主。我觉得他批评得对。不过我们的理由是，如以 Ponetic Law 为主，用极少时间可以得一大批的初步知识。”我看过之后就想了：我们已表现的工作固然像 Neo-grammarians，但是我们实在也没有忘记 Phonetic Law 以外的事。本篇虽然还是一个不完全的研究报告，他的作法也可以作个事实的表现吧。^④

书信肯定了贺登崧的批评是“事实的表现”，并作了辩护。赵元任阐明了采用新语法学派研究路径的意义，他认为这一路径一方面有助于“用极少时间可以得一大批的初步知识”，另一方面史语所“没有忘记 Phonetic Law 以外的事”。赵元任以“咱们”、“我们”之称呼，以明治学路径的史语所认同。赵元任的这封信说明了史语所语言组重视贺登崧的批评，而且该组成员对这一批评的回应是长期的。赵元任在1951年发表台山语料《台山语料》^⑤，董同龢在1960年发表了“四个闽南方言”都在回应这一批评^⑥。

在赵元任等人带领下，史语所语言组注重方言调查，拓展了语言学的历史维度，并积极与国际汉学界对话，奠定了中国语言学在国际学界的地位。

4. 致力于中国社会经济史、民族学、民俗学等学术新领域的开拓

19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影响了青年学者的研究兴趣和学术倾向。傅斯年非常欣赏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的青年新秀，他曾言：“希圣前办《食货》，收罗北平各大学毕业生不少，北大犹多，如鞠清远（师大，山东）、傅安华（北大，河北），皆良士也。”^⑦傅斯年、陈寅恪积极延揽从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青年学者，并对他们的研究方向予以积极引导。全汉昇曾回忆说：“进入史语所后，傅斯年先生即嘱咐我专门研究中国经济史，期盼我能拓垦这尚未有人耕耘的园地。”^⑧全汉昇在《集刊》上共发表了《南宋杭州的消费与外地商品之输入》《宋代官吏之私营商业》《唐宋时代扬州经济景况的繁荣与衰落》《中古自然经济》等16篇经济史类论文。另外，何兹全还撰写了《魏晋的中军》《魏晋南北朝的兵役》等3篇社会史论文。全汉昇、何兹全皆为陶希圣的学生，他们的加入为史语所带来了多元的研究风格。陈寅恪还曾亲自指导俞大纲从经济视角研究中古史，并发表了《读高力士外传释“变造”和“和糴”》^⑨。这一现象，可视为史语所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时代对话。

史语所初创时期较为重视民族调查工作，中山大学庞新民等人先后在《集刊》发表民族学类文章。1934年社会科学与史语所合并一事成为学界一大公案。傅斯年最终推动社会科学研究民族学组并入史语所。傅斯年的犹豫与选择，展露其有意开拓民族学研究的想法。凌纯声出版了单刊《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以及凌纯声和芮逸夫合作完成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二人还在《集刊》发表了《畬民图腾文化的研究》《记栗栗语音兼论所谓栗栗文》《苗语释亲》《僚（獠）为仡佬（猺獠）试证》等文章，这些成果

①[比]贺登崧：《有关汉语语言地理学研究的若干问题》，注释2，第25页。董同龢：《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前言”，《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本；[比]贺登崧：《有关汉语语言地理学研究的若干问题》，《汉语方言地理学》，第3页。

②《集刊》第6本第3分，第413页。[比]贺登崧：《有关汉语语言地理学研究的若干问题》，第5页。

③董同龢：《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前言”，《集刊》，第19本。

④赵元任：《台山语料》，《集刊》第二十三本。

⑤周法高：《论中国语言学》，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40页。

⑦《傅斯年致朱家骅》，《傅斯年遗札》第2卷，第951页。

⑧全汉昇：《回首来时路》，《新学术之路》下，第487-489页。

⑨俞大纲：《读高力士外传释“变造”和“和糴”》，《集刊》第5本第1分。

为傅斯年关于民族问题的学术争论提供了学术支撑^①。

傅斯年创办史语所初期积极招揽刘复组织民间文艺组，引进了青年学人李家瑞。改组为史语所搜集了大量民间歌谣资料，这些俗曲资料达到八千余本，被认为“目前世界上收藏中国俗文学资料最丰富的地方”^②。李家瑞在《集刊》发表了《打花鼓》《说弹词》《由说书变成戏剧的痕迹》等文章，拓展了史语所的学术议题范围。刘复去世和李家瑞离开后，民国时期的史语所在民间文艺研究领域失去了学术传承。

另外，史语所初创时，顾颉刚与傅斯年曾发布“造像征集启”，并发布征集计划，“有本所助理员搜集一切刊印之材料，及在世之拓本等；分别派人到各地掘拓就近搜集；请各地认识或团体就近搜集；所中随时以卡片编此项目录”^③。赵邦彦即是受命从事该项搜集工作的助理员。赵邦彦在《集刊》以及《集刊》外编发表了《调查云冈造像小记》《九子母考》《汉画所见游戏考》等三篇文章。赵邦彦除了贯彻“动手动脚找资料”的精神外，试图进行历史解释，以探寻图像故事之历代流传。

综上所述，《集刊》作为一个学术成果发布平台，集中、持续发表史语所学人的学术成果，在中国上古史、中古史、语言学以及新学术领域开拓等方面建构了新史学特色，塑造了史语所丰富多元的学术风格，推动了史语所发展成为在国内外学界的新学术重心。

四、《集刊》与学术后备军的培养

史语所在创办之初确定了两个基本任务即集众研究和培养人才，傅斯年认为这是“此时本研究所之基本工作”。其中，青年人才的培养是史语所设置的主要目的之一。刚大学毕业之学生，经过集众研究之训练，“潜其思力、凝其兴会、开其道路”，最终发展为历史语言学在中国发达的命脉^④。史语所学者大体可分为第一代和第二代。培养青年人才是史语所第一代学者的责任。因此，傅斯年对第一代学者的要求较高，他说：“自当一体收罗此两科之学者，使国内明贤在此范围者无有遗漏，亦无滥举。”史语所创办之初，傅斯年拟定聘任的研究员主要有：蔡元培、胡适、陈垣、陈寅恪、赵元任、俞大维、刘复、马衡、林语堂、朱希祖、容庚、许地山、李宗侗、徐炳旭、李济、袁复礼、罗家伦、冯友兰、史禄国等十九人，另外中山大学同人，参与筹备并有所贡献者拟聘请的研究员有何思敬、罗常培、商承祚、丁山、容肇祖、董作宾、余永梁、黄仲琴、辛树帜，外国研究员有伯希和、米勒、珂罗倔伦^⑤。后来，傅斯年多次“拟约”加入史语所的岑仲勉，因其学术成绩已较为显著被聘为专任研究员，亦属于第一代研究人员。

《集刊》在培育青年学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代学者，为青年学者树立了榜样。第一代学者在《集刊》发表文章者有：蔡元培、傅斯年、董作宾、商承祚、胡适、丁山、余永梁、容肇祖、陈寅恪、刘复、史禄国、罗常培、李方桂、徐中舒、林语堂、朱希祖、赵元任、梁思永、李济、孟森、马衡，外国通信员高本汉，计25人，共发表文章139篇，占比33.9%。其中，在史语所发展最初十年（1928年-1937年）中，在《集刊》上发表文章最多的为第一代学者，共计119篇，占比65.7%。第一代学者的成果，成为青年学人效仿的对象。

史语所培养的青年人才即为第二代学者，他们大多大学刚毕业，以练习助理员或行政人员等身份进入史语所，其职称经历了助理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的发展，逐渐成长为史语所的骨干力量。人才的培养需要一个周期。在史语所发展最初十年中，青年学者在史语所集众式研究过程中受到严格学术训练，学术能力大大提高。十年间，第二代学者初试锋芒，在《集刊》上共发表文章51篇，占比28.2%。

1937-1945年间，中国进入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战争严重影响了学术发展，史语所考古发掘、语言调

①黄克武：《民族主义的再发现：抗战时期中国朝野对“中华民族”的讨论》，《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4期。

②曾永义：《“中央研究院”所藏俗文学资料的分类整理和编目》，《说俗文学》，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第1页。

③《所务记载》，《集刊》第1本第1分。

④《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报告书第一期》，第30页。

⑤《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致蔡元培、杨铨》，《傅斯年遗札》第1卷，第128-130页。

查、民族调查等学术活动受到严重干扰，甚至停止。抗战时期，史语所所址几度迁移，《集刊》出版难以正常进行，仅出版了第七本第四分、第八本第一到四分、《史料与史学》和《六同别录》。《史料与史学》和《六同别录》上发表的文章，抗战结束后经整理得以重新发表。图书资料，是国内众多学者纷纷奔赴史语所、求学史语所的吸引力所在。青年学者在李庄获得了难得的学术氛围，逐渐成长为史语所发展的学术后劲。1945-1949年间，《集刊》共发表了183篇文章，史语所第一代研究员发表了39篇，占比21.3%。第二代研究人员共发表141篇，占比77%。两代学者在《集刊》发表论文数量和比例，充分说明了史语所完成了学术的代际转换，第二代学者逐渐成为史语所发展的中流砥柱。1949年，史语所研究人员或留在大陆，或到台湾，或到海外。他们逐渐发展为各区域、各学术领域的学术领军人物，并担负起培养第三代学术新秀的任务。

结语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推动了史语所学派的构建。《集刊》以刊物的形式贯彻了傅斯年注重“发明学术”的办所宗旨，建构起高质量的作者群。这个群体以史语所学人为主体的，辅之于特约研究员、通信研究员，并积极吸收国内外各高校、科研院所的学者，形成了具有强烈文化认同的学术共同体。《集刊》建立了编辑委员会，负责征稿、审稿，保证了学术研究的创新性。《集刊》自觉打造历史学和语言学的国内外学术高地，扩大了史语所在国内外学界的影响力。《集刊》充分发挥培养学术后劲的办所初衷，完成了史语所第一代学者与第二代学者的代际转换，推动了史语所学风的传承和发展。从践行学术宗旨到注重学术创新，从引导国内学人到与国际学界对话，再到成为培养青年学人的助推器，《集刊》可谓为建构史语所学派的主要阵地之一。

“Invention Scholarship”: the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chool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LIU Chun-qiang, LI Yi-ping

(School of Marxism,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252059,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of Academia Sinica represented the model of Chinese scholarship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ity. With the orientation of “inventing scholarship”, the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had improved the quality of academic papers through the system of soliciting and reviewing manuscripts, strived to build the academic center of gravity, focused on training the academic reserve army, and promoted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scholars in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Therefore, the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could be said to be one of the main position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chool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Key words: the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the School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inventing scholarship”; build the academic center of gravity;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scholars in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责任编辑 山阳]